



Minnena ser mig

Tomas Tranströmer

记忆看见我

[瑞典] 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 著

马悦然 译

记忆看见我

[瑞典] 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 著

马悦然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巨大的谜语·记忆看见我 / (瑞典) 特朗斯特罗姆著
; 马悦然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2
ISBN 978-7-208-11028-1

I. ①巨… II. ①特…②马… III. ①诗集—瑞典—
现代②特朗斯特罗姆, T. —自传 IV. ①
I532.25 ② K835.3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2776 号

责任编辑 邵艳美

书籍规划 陈文芬 (Wenfen C. Malmqvist)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

巨大的谜语·记忆看见我

[瑞典] 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 著 马悦然 (Göran Malmqvist)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**人民出版社**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8
插 页 4
字 数 83,000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1028-1/I·1063
定 价 45.00元

本书译文献给亲爱的妻子文芬

目 录

译者序	119
记忆	121
博物馆	135
小学	147
战争	157
图书馆	167
初中	179
驱邪	197
拉丁文	207
附录：托马斯最早的诗	219

译者序

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自传性的文本《记忆看见我》，虽然出版于1993年，但是肯定完成于托马斯1990年中风之前。《记忆看见我》的八个篇章中，托马斯叙述他最早的零星记忆，素描他母亲与他最亲爱的朋友、比他大七十一岁的外公，和小学、初中与高中同学、老师的画像。托马斯引领读者进入他热爱的博物馆与图书馆，也让读者体会到十几岁的他如何憎恨战争威胁欧洲文化的残忍力量。这些快乐时光的记述，也伴随着暗淡悲惨的绝望。

托马斯读高中的最后两年，开始对文学，尤其是诗歌很感兴趣。那时正是瑞典现代诗的黄金时代：自由诗替代传统的格律诗。可是托马斯选择了他自己的路。他阅读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时，精通了形式对诗歌的重要性。从那时起，托马斯的诗作经常借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格律。

托马斯高中毕业三年之后，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诗集《诗十七首》(17 *dikter*)。他就读高中时所写的诗没有选入《诗十七首》，因此我将这些诗译成中文，列在《记忆看见我》正文之后作为参考。

Minnen

记 忆

“我的一生。”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看见面前一道光线。仔细看，那光线真像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。彗星的头，其最明亮的一端，是童年和青春期；彗星的核心，其最密集的部分，是决定生命最重要特征的幼年。我努力回忆，努力钻进那时代。可是在这浓密的地区中移动很难，很危险，我感觉到我会接近死亡。再往后，彗星越来越稀疏，有越来越宽的尾巴。我现在处于尾巴的后端。写这回忆录时，我已六十岁了。

最早的记忆多半是抓不到的。仅是叙述的复述，记忆的记忆与突然的高潮所引起的情绪。

我最早的记忆是一种感觉，一种骄傲的感觉。

我刚满三岁，有人告诉我这很重要，说我现在长大了。我躺在一间很明亮的屋子里的床上，然后起床在地板上走几步，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正在长大了。我有一个布偶娃娃，我给她取了我所能想像的最美丽的名字：卡琳·斯品纳。我对待她一点都不像一个母亲对待孩子。她更像一个朋友，或者我爱上的一位姑娘。我们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，我们的地址是史威登堡街（Swedenborgsgatan）三十三号 [现在改名为篱笆门大街（Grindsgatan）]。爸爸还是我们的家长，可他很快要离开我们。我们的家庭是相当“现代”的——从小我对父母就用“你”这个称呼。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附近，在布莱金厄街（Blekingegatan），转弯就到。

我的外公，卡尔·黑尔默·魏斯特白格（Carl Helmer Westerberg），生于1860年。他是一位领航员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比我大七十一岁。奇

特的是，他跟自己的外公的年龄差别是相同的，他的外公生于1789年：巴黎的居民猛烈攻进巴士底，瑞典贵族反叛国王的兵变失败了，莫扎特写着他的单簧管五重奏。人类历史上相等的两步，漫长的两步，可并不太长。我们够得着历史。

外公讲的是19世纪的语言。他很多的表达方式，今天的人听起来会认为是非常过时的古怪。可是对我来说，外公讲的话听起来很自然。外公的个子不高；他有一对雪白的八字须和一个相当大而稍微弯曲的鼻子——“真像个土耳其人”，他自己这么说。他的性情是比较活跃的，他有时候会生气。但是没人把他的发作当一回事，马上就过去了。他简直不会怄气。其实他多么愿意和解的样子，会让人认为他是个三心二意的人。要是有人背地里谈论别人的坏话，外公老会替那人辩护。

“爸爸，你当然必得同意那人是个坏蛋！”

“那我倒没听说过。”

父母离婚以后，妈妈跟我搬到福尔孔街（Folkungagatan）五十七号。那座大楼容纳、混杂着一群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的人。我对那大楼与其房客的回忆有一点像一场30年代或40年代的电影。可爱的看门人的妻子和她那不爱说话且身体很壮的丈夫。我钦佩那看门人的一个原因是他曾被煤气毒害过——那暗示他英雄般地接近过很危险的机器。

除了房客，很少人出入那大楼的大门。偶尔会有醉汉在楼梯上睡觉。每星期会有乞丐按我们的门铃儿。他们叽里咕噜地站在楼梯平台。妈妈给他们涂上奶油的面包，不给他们钱。

我们住的是五层楼。最高一层。除了到顶楼

的门，楼梯平台上还有四道门。一道门上写着“娥尔克，新闻摄影师”。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师的邻居，真给我一种时髦的感觉。

我们透过墙壁听得见的隔壁邻居，是一个皮肤浅黄的中年单身汉。他在家里工作，好像是一种用电话做生意的代理人。讲电话的时候，他常常大笑，一种透过墙壁、令人着迷的笑。另一种常常听得见的声音是软木瓶塞发出砰的一声，那个时代的啤酒瓶子没有金属的盖子。这些跟兴奋有关系的声音，好像一点都不适合我偶然在电梯里会遇见的、那像幽灵一样苍白的老头儿。后来他对别人起疑心，笑声越来越稀少。

有一次发生暴力。我那时很小。一个邻居喝得烂醉如泥，他妻子把门锁了，拒绝他进来。那人大闹，用尽全力想把门打破。我记得他大声嚷：

“我他妈的不管你把我送到王岛去！”

“王岛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妈妈。

妈妈解释说王岛是警察总局所在的地区，因此王岛这个地区名声不好。（1939年到1940年冬天，王岛的一所医院里，我看见在芬兰打仗受重伤的士兵以后，这个感觉更加强了。）

妈妈清早上班去了。她不乘车，她总是走路的。从她开始工作一直到退休那年，从首都的南区走路到首都的东北区——她在东北区的一个小学教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。年年就教那两个年级的学生。她是一个专心致志的老师，也热爱她的学生们。你也许会想像退休对她来说很不容易接受。一点都不，她感到轻松极了。

因为妈妈是公务员，我们家里雇一个女仆。她主要的任务是看护我，因此应该管她叫保姆。

她睡在跟厨房连起来的一间窄小的房间。这房间算是厨房的一部分，没有包括在我们住所“两房一厨”的设计中。

我五六岁时，我们雇来的保姆叫安娜·丽萨。她来自瑞典最南的一省的一个小城市。我觉得她很有吸引力：一头鬈曲的金发，一个稍微翘起的鼻子，一种柔软的南方方言^[1]。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。我每次坐火车经过她原来住的城市的火车站，我都会体验到一种特殊的情感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在这魔幻的地方下火车。

她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姑娘，很会绘画。她的专长是画迪斯尼卡通电影的角色。30年代末年，我一直在绘画。外公给我带来那个时代所有的食品杂货店所用的白色包装纸，我则在包装纸上画

[1] 瑞典最南的省份的方言甚受丹麦语的影响，跟其余的瑞典方言大不相同。——中译注，下同



母亲与儿子（1933年春天）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